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陶海青

编者按:30年前,中国农村的第一次改革由土地制度改革破题,实现了土地由“合”到“分”;30年后,农村改革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土地由“分”到“合”已是大势所趋,而地方对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探索也从未停止过,且模式日渐增多。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随着中国发展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进程加快,突破“一家一户”局限,高效盘活闲置土地,创新土地流转模式,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将成趋势。

家庭农场获政策扶持 农业投资初现新模式

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面临效益递减困境,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农业改革的十字路口。

家庭农场成为突破口。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流转,这些个人和机构将获得更多的国家补贴。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张晓山预计,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将会成为未来主旋律;扩大农业的规模,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张晓山表示,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在稳定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基础上,较大幅度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这样使劳动者的收入实现较大增长,同时,使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得到保证。因此,农业规模化经营能够实现双重目标,既确保农民的收入增长,又确保中国粮食安全。

张晓山同时指出,中国的规模化经营和西方的大农场经营模式将有所不同。因为中国的土地资源现状是人多地少。所以中国是适度规模,不可能出现像西方那样一个农户经营几千亩,乃至几万亩土地。

曾在美国承包农场达6年之久的北京车行天下房车俱乐部董事长刘杰对记者表示:“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将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次深刻变革。中国农业从小规模生产向规模化、市场化方向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但与美国相比,中国对家庭农场的定义过于笼统,也没有准确的界定标准,其发展需要循序渐进。”

土地撂荒现象有望缓解

事实上,在中国“家庭农场”是一个起源于欧美的舶来品,它类似于种养大户的升级版,通常定义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在刘杰看来,中央一号文件首提发展“家庭农场”,除了它能够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推动农业商品化的进程外,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能够有效地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而导致的土地闲置抛荒问题。

袁源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销售经理何继伟在北京郊区生活,一直关注家庭农场的发展。他说:“惠农以及种地补贴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近年来,农民不再以土地为生,一些地区的土地撂荒现象十分严重,没有田埂的坡地上,根本看不出土地原本

的面目,令人痛心。”

山西省怀仁县南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书记马维宗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他很早就建议记者到下面走走,“农民种田亏本,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曾经的良田沃野长满荒草。另外,商业占地、圈地以及矿山开采,都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地荒废,农村的生态环境已严重恶化。如果任由土地撂荒,将危及中国粮食安全。”

要解决这一问题,家庭农场被视为一个突破口。分析人士认为,必须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加强国内的土地流转规模和力度。

“只要保持农民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村办合作家庭农场的探索就值得肯定。”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介绍,江苏省太仓市是国研中心一直关注的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示范基地,从太仓模式来看,土地流转也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说家庭农场。

太仓的做法是,农民集中居住后腾出的土地和农户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组建合作农场统一生产经营,入股农户获得股金分红,参与生产农民获得薪金收入。

事实证明,在村级经济体,太仓推行土地、劳动力、资金股份合作,使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渠道得到拓宽。兴办合作家庭农场,不仅使闲置土地得到有效使用,也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开辟了新的路径。

“通过家庭农场,实现对农村闲置土地的开发,撬动资金流向农村,大量资金用于新农村建设。这是一种改革举措,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拓展了空间,为农民增加了利益。”韩俊如是说。

目前,太仓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新阶段,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经济社会基础,强化了农业的战略性和基础性地位。

中国家庭农场试点一波三折

家庭农场,这个原本在美国和西欧等国家已经很成熟的土地经营形式,如今正在上海松江、湖北武汉、吉林延边、浙江宁波、安徽郎溪等地迅速拓展,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据统计,农业部确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6670多个。

其中,武汉家庭农场的发展就是一个缩影。早在2010年,武汉市就开始不断健全和创新土地流转机制,在推动土地向龙头企业集中的同时,还鼓励一些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通过承租、承包、有偿转让、投资入股等形式,集中当地分散土地进行连片开发,发展“家庭农场”。

但据记者了解,武汉家庭农场自一问世便遭遇重重困难。

据农场主魏晓东介绍,他们自主研发的六种彩色樱桃小番茄很受消费者青睐。

“虽然品质好收成好,但是要能卖出去才会有利润。武汉市的家庭农场虽然初具规模,但由家庭农场自创的品牌寥寥无几,能叫得响的品牌就更少。再好的蔬菜,如果无品牌无包装就不能进商场和超市,那么高端无机蔬菜就等同于普通蔬菜。”何继伟如是说。

“亏了几十万元。”谈起前期的经营状况,武汉江夏区麦牙家庭农场负责人徐治安显得有些尴尬。

魏晓东坦言,武汉市现有的家庭农场经营规模都比较小,生产和销售能力也很有限,单个家庭创品牌有难度,亟需政府更多扶持。

刘杰认为,中国家庭农场还处于起步阶段,政府不能只鼓励大面积建设家庭农场,而首先要解决农场的产品销路难题,要及时将新鲜蔬菜卖出去。政府除了给予技术指导外,还需在市场方面给予引导。家庭农场的产品不仅仅只是进入超市和批发市场,还应拓展其它销路。同时,家庭农场还要打造自己的品牌,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要“走出去”。

在2011年,武汉市政府采取了“先建后补”政策,利用家庭农场盘活闲置土地,首批家庭农场试点初获成效。截至2012年年底,政府扶持资金达664万元,已扶持各类农业家庭农场167家,平均每个家庭农场获补贴近4万元。家庭农场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0%以上,家庭农场农业年收入均达20万元以上。

据悉,在武汉,一些懂农业技术、懂经营管理的农村青年开始放弃到城里务工,愿意在家乡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他们被认为是未来的职业农场主。

武汉市农业局表示,家庭农场运营成熟后,还将探索“合作农场”、“公司+家庭农场+基地”等模式,降低家庭农场的经营风险。

实际上,除了农业部已确定的6670多个“家庭农场”外,还有很多农业人通过承包土地开展规模种植、特色种植等方式成为名副其实的“家庭农场主”,也为“家庭农场”探索出一条新路。

中国的北大荒曾带着浓烈的军事色彩,这里曾以屯垦戍边为主要任务建设军垦农场。在经历了30年的改革后,这里催生出20多万位农场主,葛柏林被认为是第二代北大荒家庭农场第一人。

从1985年开始,葛柏林就率家人在荒原上独自奋斗,坚持种树绿化北大荒,致力于为后人重现昔日北大荒的良好生态。为保护一片原始湿地,他曾数次以自家的良田换荒地。

截至目前,葛柏林已开垦荒地6000多亩,承包经营上万亩土地,先后给国家生产粮食数万吨,并添置了价值数百万元的四五十台套大型农机具,实现了从

整地、种植到秋收的全程机械化,打造出一个现代化经营的中国式家庭农场。

美国家庭农场的成功之道

在美国,农场是农业的基本生产单位,90%左右的农场是家庭农场,其余是公司农场。

“美国农民只占其总人口的1%,却能养活所有美国人。美国发展家庭农场的经验值得借鉴。”据刘杰介绍,美国的农业机械化程度非常高,一个美国农民耕种约18000亩土地,不是天方夜谭,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这其中农业机械功不可没,是农业机械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

在美国,农民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在土地上苦苦挣扎的下等人。恰恰相反,农民很富有。刘杰说,在1998年,他在美国夏威夷一处冲浪圣地旁边承包了一个农场。这片农场有100多亩,一共只有6个人管理。农场种植各色瓜果蔬菜,成熟的果实被周边的宾馆饭店全部采购,年利润有10多万美元。

刘杰特别提到:在美国,家庭农场常使用带有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大型拖拉机。这种拖拉机由电脑控制,由卫星导航在田间作业,无需人工操作,很多美国中等规模的农场和大型农场都已安装了GPS定位系统。另外,还有20%的美国农场使用直升机进行耕作管理。同时,他们还使用生物技术来提高产量,通过签订期货合约来规避风险。

数据也显示,在2010年,美国所有农场的年收入都超过100万美元,其中,家庭农场占88%,他们的产量占全美的79%,美国大型家庭农场的农场主都是富有的商人。

韩德森原来是美联储农业经济的高级分析师。他说:“2010年和2011年,美国农业收入一直在增长。美国农业净收入这几年每一年的增长率都超过20%。农民现金充裕。”

与此同时,美国农业补贴的集中度很高,90%以上的农业补贴集中在5种农作物:小麦、大豆、玉米、大麦、棉花,这有利于提高大宗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由于补贴与农作物的面积和产量挂钩,大型家庭农场主便成为农业补贴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据美国农业部估计,目前,大约30%的大农场获得了大约70%的补贴,美国政府为了拓展海外市场,还对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给予出口补贴,提高了大农场的生产规模和竞争力。

刘杰认为,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给美国农民带来了巨大实惠,不仅提高了农民收入,而且也缩小了城乡差距。显然,补贴政策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优势,提高了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头号农产品出口大国,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补贴。

记者手记

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不断深入,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像候鸟迁徙一样进城打工,有些还扎根城市。

与之相对应的是,农村出现了“劳力荒”,村里留守的大多是老人和儿童,导致大量土地闲置甚至荒芜。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遭遇发展瓶颈,零星的分散的土地经营模式收益甚微,无法继续发展,也无法与国际农业市场抗衡。

中央一号文件无疑是破局之举。创新土地流转模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做法值得肯定,这将是推动中国农业生产逐步走上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道路的一条有效途径。

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人多地少、人均土地面积严重不足,小农经济、土地家庭经营模式,还将长期存在,这是

土地,农民的家園

中国农业最大的基本国情,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循序渐进。

其中,最关键的是建立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动制度。在促进土地流转过程中,真正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坚持农地农有、农地农用,防止发生大规模土地兼并。

对此,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负责人日前表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主要是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户承包地;要兼顾劳动生产率与土地产出率,把握好土地经营规模的“适度”。

如果家庭农场要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防止某些人套取国家扶持资金,让家庭农场健康有序发展。

